

馬克斯與愛爾蘭*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在這裡有三項考察的重點；在馬克斯的想法中，馬克斯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如何（或是階級與民族／族群的關係如何）？馬克斯對於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統治有何想法？他對於愛爾蘭的前途有何診斷、以及具體的建議？最後，我們將以馬克斯過世後的發展，來看他的接班人如何看待民族主義，以及簡單回顧愛爾蘭後來的實際地位，看看跟馬克斯的預測有什麼出入的地方。

關鍵詞：馬克斯、愛爾蘭、民族主義、社會主義

*發表於台灣歐盟研究協會主辦「馬克斯兩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18/5/5。

Alas! it is not about popes, but about potatoes, that the minds of this unhappy people are agitated. It is not from the spirit of zeal, but the spirit of whiskey, that these wretches act.

Edmund Burke (1813: 244)

Lastly, England today is seeing a repetition of what happened on a monstrous scale in Ancient Rome. Any nation that oppresses another forges its own chains. Thus,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Irish Question is very clear. Its first need is to encourage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o this end the great blow must be struck in Ireland.

Karl Marx (1870/3/28; MEI, 1972: 163)

When Irish questions, or rather the Irish Question, for there is but one, has been forced on our attention, we have felt like a dreamer in a nightmare, oppressed by the consciousness that some great evil was rapidly advancing, that mere exertion on our part would avert it, but that we had not the power to will that exertion.

Nassau William Senior (1884: 98)

Our freedom must be had at all hazards. If the men of property will not help us they must fall; we will free ourselves by the aid of that large and respectable class of the community - the men of no property.

Wolfe Tone (Connolly, 2013: 57)

Although it is perfectly legitimate for a political scientist to analyze, and indeed to expose the flaws in Marx's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pointless to write them off as incoherent because of certain formal weaknesses.

Joseph A. Petrus (1971: 823)

壹、前言

一般認為馬克斯主義 (Marxism) 與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相互競爭、甚或排斥，因為馬克斯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斯 (Karl Marx, 1818-83) 與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95) 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說過「工人無祖國」¹：

還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國家、取消民族。工人沒有祖國，我們無法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民族的差異與彼此的對立日益消失。

然而，他們後來對於民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有很大的修正，尤其是毫不掩飾對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建議英國跟愛爾蘭斷絕彼此的政治結合，雖然並不排除兩者或可自由地建立聯邦關係 (MEI, 1972: 143, 280)。馬克斯在 1867 年 (11/30) 寫信給恩格斯，斬釘截鐵建議愛爾蘭必須：(一) 由英國獨立、成立自治政府；(二) 不能寄望英國、必須自己著手土地改革；及 (三) 使用關稅來保護本身的工業、以防止英國產品的傾銷 (MEI, 1972: 148)。

馬克斯與恩格斯在 1848 年歐陸革命失敗後，被迫流亡英國，才開始真正有機會第一手瞭解當地勞動階級的情況，經過長期的觀察，終於覺悟到必須修正先前的看法；特別是恩格斯的前後伴侶瑪莉·伯恩斯 (Mary Burns, 1823-63)、及莉齊·伯恩斯 (Lizzie Burns, 1827-78) 姊妹是曼徹斯特的愛爾蘭裔女工，鶼鶼情深、愛屋及烏²，讓他體會英國革命對歐洲革命的重要性、及愛爾蘭革命對英國革命的重要性 (Cummins, 1980: 108-10)。如果這

¹ 原文是：

The Communists are further reproached with desiring to abolish countries and nationality. 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We cannot take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got. Since the proletariat must first of all acquire political supremacy, must rise to be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must constitute itself the nation, it is so far, itself national, though not in the bourgeois sense of the word. 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antagonism between peoples are daily more and more vanishing,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to freedom of commerce, to the world market, to uniformity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corresponding thereto.

² 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有兩個房子，一個在市中心、一個在勞動階級聚居的郊區，多年收留幾十名愛爾蘭運動者 (Rodden, 2008: 615)。

只是單純的歷史偶然 (historical contingency)，當然就沒有特別值得探討的地方。我們以為，馬克斯與恩格斯在理論上的轉折，並非只是感情上的羈絆。

根據馬克斯 (Mark, 1844/8/7)，革命是推翻既有統治力量、及舊狀態解體的政治行動，如果沒有革命、就不可能會有社會主義；然而，革命畢竟只是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一旦組織的行動開始，自己的目標、以及精神浮現，就要把政治的殼拋棄³。Cummins (1980: 12-14) 以為，馬克斯主義起源於西歐，特別是馬克斯對於德國哲學、法國社會主義、及英國經濟的浸淫；他比喻道，如果說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孕育於社會革命的子宮，而政治革命則是社會革命的高潮，那麼，實力就是關鍵一刻的催生婆。

原本，馬克斯與恩格斯把社會革命寄望在資本主義的三個核心堡壘，也就是英國、法國、以及德國，特別是在 1848 年歐洲革命烽火四起的前後。然而，儘管德國有犀利的哲學批判、卻缺乏行動，無法把理論轉換為群眾的利器；法國雖然有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產階級對於雞啼的號召似乎卻步；他們最後寄望當時工業革命已臻成熟的英國，希望能一舉結合德國的哲學革命、以及法國的政治革命，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革命 (Cummins, 1980:14-17)。也因此，他們在 1840 年代、1850 年代初期，認為愛爾蘭人的民族自決訴求是反動的。

然而，到了 1850 年代後期，馬克斯與恩格斯原先不止對於法國、以及德國的期待幻滅，對於英國勞動階級⁴ 也開始大失所望，漸漸轉而關注愛爾蘭這塊英國的最早殖民地。進入 1860 年代，他們發現英國勞動階級越來越像資產階級⁵，竟然企盼能跟資產階級平起平坐就好，想要把自己變成資產

³ 原文是：

All revolution – the overthrow of the existing ruling power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order – is a political act. But without revolution, socialism cannot be made possible. It stands in need of this political act just as it stands in need of destruction and dissolution. But as soon as its organizing functions begin and its goal, its soul emerges, socialism throws its political mask aside.

⁴ proletariat，亦即工人、或譯為無產階級。

⁵ bourgeoisie，亦即資本家，或譯為布爾喬亞。

階級貴族、及資產階級般的勞動階級⁶，因此決定策略上必須改弦更張，在 1860 年代末期、1870 年代初期，斷然把戰略焦點放到愛爾蘭，熱切相信愛爾蘭的獨立可以加速英國、甚至於整個歐洲的社會革命（Rodden, 2008: 609-11）。

儘管馬克斯從未踏足愛爾蘭（Rodden, 2008: 519），他在 1869 年（12/10）寫信給恩格斯說，他長久以來以為愛爾蘭的自由必須決定於英國勞動階級的革命，然而經過一番研究，現在的想法剛好相反，深信除非英國擺脫愛爾蘭，否則，英國勞動階級將一事無成⁷，也就是「槓桿必須放在愛爾蘭」⁸（MEI, 1972: 284）。他在 1870 年（3/28）寫道⁹，「任何壓迫他人的民族是在鍛造本身的枷鎖」，看到此刻的英國正在重蹈古羅馬的覆轍，因此主張為了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勢必在愛爾蘭予以決定性的重擊（MEI, 1972: 163）。

Rodden（2008: 611-12）指出，這樣的訴求有三個理論上的自我矛盾：愛爾蘭還停留在農業社會、違反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循序漸進發展、以及如何面對一向被視為反動的民族主義。Rodden（2008）的客氣理解是，兩人跟愛爾蘭有獨特的個人經驗¹⁰，因此對愛爾蘭人產生強烈

⁶ 這是恩格斯（1858/10/7）跟馬克斯的抱怨，原文是：

... the fact that the English proletariat is actual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bourgeois, so that the ultimate aim of this most bourgeois of all nations would appear to be the possession, alongside the bourgeoisie, of a bourgeois aristocracy and a bourgeois proletariat.

⁷ 馬克斯稍早（1869/12/10）寫信給好友 Ludwig Kugelmann，也有類似的說法（MEI, 1972: 280）。

⁸ 原文是：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d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overthrow the Irish regime by English working class ascendancy. I always expressed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e *New York Tribune*. Deeper study has now convinced me of the opposite.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will never accomplish anything before it has got rid of Ireland. The lever must be applied in Ireland. That is why the Irish question is so important for the social movement in general.

⁹ 馬克斯（1859）早先就有類似的看法，把位原屬於希臘的保護地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比為印度、或是愛爾蘭，指出英國為了國內的自由、卻在外國奴役他人。

¹⁰ 恩格斯在 1842 年（22 歲）被父親派到英國曼徹斯特學習經營紡織廠，他在 1843 年為瑞士的刊物《瑞士共和黨人》（*Schweizerische Republikaner*）寫了〈來自倫敦的信〉，報導愛爾蘭政治領導者 Daniel O'Connell（1775-1847）連續四天萬人空巷的演講及遊行，

的人道關懷、對於愛爾蘭農民情有獨鍾，才会有如此詭異乖離「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 的見解，竟然主張將愛爾蘭當作槓桿的槓桿、甚至於頸動脈 (pp. 614-15)。

不過，Zwick (1983: 18-19) 提醒我們：馬克斯在寫作的時候，不管是風格、或是內容，一定會針對他訴求的對象、以及傳播的方式量身裁衣，所以，如果想要瞭解什麼是真的他，必須花一點心思去抽絲剝繭；譬如《共產黨宣言》的對象是歐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修辭的用意是煽風點火，相對地，《紐約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 的讀者是美國的自由派，用字譴詞當然不能虛張聲勢；換句話說，馬克斯有他私下作為人的一面 (the man Marx)、也有作為理論家的公開一面 (the theories of Marx)，或許在特定的一刻是民族主義者、抽象思考之際是國際主義者，因此，儘管他或許有一些民族主義的傾向，如果指控馬克斯崇拜民族國家，那是言過其實、也是不瞭解馬克斯主義。

由於馬克斯主義關心的是資本累積、及其影響，重點是歷史唯物論框架下的階級，並未針對民族主義有完整的一套理論，那是可以理解的 (Munck, 1986: 1-2, 9)；Poulantzas (2000: 93) 甚至於直言，根本沒有所謂馬克斯主義觀點的民族理論；Anderson (2010: 123-24) 也認為，馬克斯與恩格斯其實並未有系統地分析愛爾蘭的民族主義。Golman 也同樣地承認，兩人儘管對於愛爾蘭歷史有獨到的見解，並沒有通盤的研究 (MEI, 1972: 20)，而 Greaves 也認為兩人沒有機會有系統地整理他們對於愛爾蘭的看法 (MEI, 1972: 15)。

儘管如此，我們未嘗不可從馬克斯與恩格斯比較新聞性、或是宣傳性

主題是廢除愛爾蘭與英國的結合 (Repeal)，被收在《愛爾蘭與愛爾蘭問題——馬克斯與恩格斯選集》的第一篇。在這篇報導中，恩格斯除了描述愛爾蘭工人在英國的悲慘，譬如交不出房租、被二房東發現陳屍溝渠，還指控 O'Connell 是孛種的雙面政客，只會利用被壓迫的愛爾蘭人來幫自己的中產階級朋友進入國會，並不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立場 (MEI, 1972: 419, note 1)；參閱恩格斯 (Engels, 1845；MEI, 1972: 37-43) 在《英國工人生活條件》(*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大城市〉(The Great Towns) 這一章，有關於「小愛爾蘭」貧民窟的描寫，包括衛生條件惡劣、婦孺被貧窮的英國人收養等等。

文字，耙梳一些關於民族主義、以及愛爾蘭的看法。蘇聯進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在 1971 年出版了一本馬克斯與恩格斯有關愛爾蘭的文集¹¹《愛爾蘭與愛爾蘭問題——馬克斯與恩格斯選集》（*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Karl Mark and Frederick Engels*），並在次年於美國發行（Marx & Engels, 1972；簡稱 MEI），蒐集兩人在 1843-91 年之間關於「愛爾蘭問題」（Irish Question）的各種文稿，包含個人的專書摘錄¹²、講稿、背景資料，以及彼此之間、及兩人跟他人透過信函的討論。

我們在這裡有三項考察的重點；在馬克斯的想法中，馬克斯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如何（或是階級與民族／族群的關係如何）？馬克斯對於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統治有何想法？他對於愛爾蘭的前途有何診斷、以及具體的建議？最後，我們將以馬克斯過世後的發展，來看他的接班人如何看待民族主義，以及簡單回顧愛爾蘭後來的實際地位，看看跟馬克斯的預測有什麼出入的地方。

貳、馬克斯主義與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一種信念，是指一群人想像彼此是一個福禍與共的共同体、而且相信大家的福祉必須有國家的庇蔭才能獲得保障，因此希望能透過民族自決權（national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的實踐來獲致自己的國家，而這種國家稱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一套理念的哲學基礎是自由、以及平等，原本是用來號召百姓掙脫專制王朝、或是異族統治（施正鋒，2015、2017）。其實，民族運動不分左派、還是右派，大家都可以用，卻不免被野心者拿來當作侵略的號召；如果以希特勒歸謬法（*reductio ad Hitlerum*）來看，原來是自保的鹿群當然就會被視為嗜血的狼群（Zwick, 1983: 5）。

¹¹ 英國歷史學家 C. Desmond Greaves 幫忙寫序，蘇聯人 L. I. Golman 寫了不算短的介紹。本選集的優點是編者在書後有詳細的註解，幫忙讀者提供背景說明。

¹² 譬如馬克斯在《資本論》（*Capital*, 1867）第一冊的第 25 章還特別舉愛爾蘭為例，說明資本如何累積的一般法則（MEI, 1972: 99-116）。

邏輯上，民族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有四種可能的關係（Connor, 1984；Sporluk, 1988）：水火不容（馬克斯主義者無法接受民族主義）、相互包含（馬克斯主義包含民族主義、或是民族主義包含馬克斯主義）、及彼此有交集（兩者有相容、也有互斥的地方）。第一種觀點是把民族主義當作右派的專利，真正的馬克斯主義的信徒當然不能接受歧路亡羊；第二種看法則是把民族主義當作馬克斯主義的一個面向，也就是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有時候不妨盜用民族主義的糖衣來包裝馬克斯主義，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棄之如敝屣，或可稱民族式的馬克斯主義（national Marxism）；第三種認為如果要達成民族解放，馬克斯主義的思想也可以挪用來號召群眾，尤其是社會的弱勢群眾，這是帶有馬克斯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Marxist nationalism）；第四種則是保持開放的態度，認為彼此有重疊處、甚至相互交織，也就是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既可以相輔相成、也有可能牴觸之處。

對於馬克斯的思想持正面評價的人來說，即使他有時候聽起來好像是民族主義者，其實是人道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具有包容性；相對地，也有人認為他是如假包換的民族主義者、甚至於就是種族主義者，真真假假，儘管裹著國際主義的外衣，骨子裡頭是日耳曼民族至上（Zwick, 1983: 18-19）。針對馬克斯對於民族運動的曖昧、不一致、混亂、甚至於搖擺不定，Zwick（1983: 15-18）以為這些都是誤解，因為他既不是教條的空想家、也不是超然客觀的社會科學家、更對於現實的政治權力或是政黨鬥爭沒有興趣¹³；他所關注的是嚴謹的實證主義與戰術彈性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因此，審度政治脈絡的變動、並經過科學的評估，即使面對矛盾的歷史潮流，出於政治的必要性，當下立斷著手理論的修正、甚或拋棄思想的原則，不會拘泥於特定的意識形態觀點，當然也不是機會主義者。

¹³ 儘管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1847-52）、以及第一國際（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4-76）後來因為各國代表的內鬪而解體，不過，主要是因為立場不同、雞兔同籠，譬如馬克斯面對俄羅斯的巴枯寧（Mikhail Bakunin）、法國的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以及德國的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等人的挑戰，只是他們剛好有不同的國籍罷了（Zwick, 1983: 22）。有關於第一國際的傾軋，見 Cummins（1980: chap. 5）。

Zwick (1983: 20) 指出，那些對於馬克斯的誤解，相當程度是根源於對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與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混淆。對於世界主義的信徒來說，民族並非正面的政治力量、在革命的過程沒有角色，也就無法透過民族主義的途徑來獲致革命；相對地，國際主義者相信在不同的歷史傳統下，只要是在民族勞動階級的帶領下就可以達成革命目標，因此是可以接受民族、以及國家；換句話說，起碼在過渡時期，馬克斯主義是可以接受民族主義，而國家終究是勞動階級的民族國家。

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基本策略，是寄望藉著資產階級的民主化來弱化封建制度、甚或加以掃除，在這同時，必須強化勞動階級本身的政治權力，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共產革命來達成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對他們來說，身為社會最進步的階級，勞動階級必須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一方面推動本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則要帶領整個社會前進；否則，如果依據統治階級所推動的民族主義，他們將會把本身的利益當作整個民族的利益 (Ruairc, 2004)。Cummins (1980: 50) 指出，馬克斯與恩格斯認為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萌芽中的勞動階級需要伴侶，特別是在那些封建制度還是徘徊不去的社會，自己原本在經濟上就是弱勢，如果又要面對外族的支配，為了避免多面作戰而疲於奔命，這時候，暫且與熟悉路況的民族運動者進行戰術性結盟是可以作個案考慮、沒有必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馬克斯 (Marx, 1871/5) 在《法國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 針對巴黎公社的考察，明白表示為民族主義跟國際主義是相容的¹⁴ (Munck, 1986: 25)：

¹⁴ 原文是：

If the Commune was thus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healthy elements of French society, and therefore the truly national government,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as a working men's government, as the bold champion of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emphatically international. Within sight of that Prussian army, that had annexed to Germany two French provinces, the Commune annexed to France the worki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如果巴黎公社真的代表法國社會的所有健康成分、而且是真正的民族政府，那麼，它同時也是工人的政府，代表著勞工解放的無畏勝利，而且必須強調是國際主義。隨著已經將法國的兩個省分[亞爾薩斯省、洛林]併入德國的普魯士軍隊逼近，巴黎公社是將世界各地的工人併入法國。

然而，馬克斯與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就指出¹⁵：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是民族鬥爭。當然，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先跟本國的資產階級好好談。

.....

共產黨人同其它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是：一，在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中，他們強調並堅持所有無產階級的共同的利益，不分民族；二，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所經歷的各個階段，各地的無產階級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多年後，馬克斯（1875/5）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提醒：工人必須在自己的國家以階級的方式組織起來，而國家就是他們立即要從事鬥爭的競技場，也就是有如在《共產黨宣言》裡頭所說，階級鬥爭在「形式上」是民族的鬥爭、而非「實質上」的民族鬥爭¹⁶，

¹⁵ 原文是：

Though not in substance, yet in form, the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with the bourgeoisie is at first a national struggle. The proletariat of each country must, of course, first of all settle matters with its own bourgeoisie.

.....

The Communist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working-class parties by this only: 1. In the national struggles of the proletarian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point out and bring to the fron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proletariat, independently of all nationality. 2. In th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the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has to pass through, they always and everywhere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movement as a whole.

¹⁶ 原文是：

It is altogether self-evident that, to be able to fight at all, the working class must organize itself at home as a class and that its own country is the immediate arena of its struggle -- insofar as its class struggle is national, not in substance, but, a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ays, "in form."

可以看出有所保留。

事實上，在馬克斯、及恩格斯的眼中，民族可以分爲好、壞兩種。恩格斯在 1849 年（1/8）於《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引用黑格爾（Friedrich Hegel）的說法¹⁷，把那些被歷史鐵蹄無情踐踏的民族批評得體無完膚、描寫爲頹敗的殘餘碎片（ruined, residual fragments of peoples），譬如在 1640-1745 年支持英國斯圖亞特王朝（Stuarts）的蘇格蘭人（Gaels）、在 1792-1800 年支持法國波旁王朝（Bourbons）的布列塔尼人（Bretons）、以及支持西班牙卡洛斯親王（Don Carlos）的巴斯克人（Basques），他毫不留情地抨擊這些民族老是充當狂熱的反革命旗手，嘲笑他們的存在只是爲了抗議偉大的歷史革命、直到自己的民族特徵完全氣絕爲止，一點也不掩飾其鄙夷；至於那些壓迫、奴役他們的民族，他則相當殘酷地認爲才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推手¹⁸。

恩格斯（1849/1/8）在這篇文章以奧匈帝國裡頭倡議泛斯拉夫主義的南斯拉夫人爲例，認爲即使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這些歷史的殘餘碎片仍然是相當蒙昧無知，還自以爲能透過整個歐洲由東而西發展的逆轉來獲得救贖，也就是相信本身的解放必須靠跟俄羅斯糾結爲一體¹⁹。Marx（1867）

¹⁷ 黑格爾（Hegel, 1894: 150）認爲沒有國家的民族就沒有歷史，原文是：

In the existence of a nation the substantial aim is to be a state and preserve itself as such. A nation with no state formation, (a mere nation], has strictly speaking no history, like the nations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rise of states and others which still exist in a condition of savagery.

¹⁸ 原文是：

There is no country in Europe which does not have in some corner or other one or several ruined fragments of peoples, the remnant of a former population that was suppressed and held in bondage by the nation which later became the main vehicl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se relics of a nation mercilessly trampled under foo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as Hegel says, these residual fragments of peoples always become fanatical standard-bearers of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main so until their complete extirpation or loss of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just as their whole existence in general is itself a protest against a great historical revolution.

¹⁹ 原文是：

Such, in Austria, are the pan-Slavist Southern Slavs, who are nothing but the residual fragment of peoples, resulting from an extremely confused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That this residual fragment, which is likewise extremely confused, sees its salvation only in a reversal of the whole European movement, which in its view ought

在將近二十年後呼應，認為歐洲若非願意坐視莫斯科所帶頭的雪崩般亞洲型暴虐（Asiatic barbarism），再不然就要幫助波蘭復國，讓兩千萬英雄挺身對抗亞洲，以便自己在完成社會再生之前有喘息的機會²⁰。可見，兩人視俄羅斯為歐洲進步的重大絆腳石，至於那些想要跟她結盟以對抗奧地利的南斯拉夫人更是不屑一顧的歷史殘渣²¹，而挺身抗拒俄羅斯的波蘭，反而是值得支持的英雄。

因此，差別在於究竟民族力量是正當、還是不正當的：在諸如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等資產階級相當先進的國家（或者加上波蘭、匈牙利），民族主義可以將國家發展到革命成熟的階段，因此是進步的，相對地，在資本主義落後的奧匈帝國、土耳其、或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則是反動的；換句話說，馬克斯眼中的民族自決是否具有正當性，端賴有沒有革命的潛力，只要有助於革命，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就可以容忍、甚至於要去推動（Zwick, 1983: 23-24）。Cummins（1980: 42-43）直言，馬克斯與恩格斯之所以瞧不起南斯拉夫人，並不是因為異族壓迫的力道不夠，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革命條件不足，當然不值得人家支持。

事實上，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56）之際，馬克斯與恩格斯轉而支持土耳其在巴爾幹半島統治下的斯拉夫人獨立，立場明顯改變；同樣地，俄

to go not from west to east, but from east to west, and that for it the instrument of liberation and the bond of unity is the Russian knout — that is the most natural thing in the world.

²⁰ 原文是：

There is but one alternative for Europe. Either, under Muscovite direction, will burst around its head like an avalanche, or else it must re-establish Poland, thus putting twenty million heroes between itself and Asia and gaining a breathing spell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social regeneration.

²¹ 恩格斯（Engels, 1849/2/14）相當冷酷地宣判，除了波蘭人、俄羅斯人、以及土耳其統治下的斯拉夫人，其他斯拉夫人完全沒有前途，包括捷克人（含斯洛伐克人、摩拉維亞人）、斯洛維尼亞人、以及克羅埃西亞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自己的歷史，初步的文明是異族加鎖所賦予的，既無能也沒有意願獲致任何形式的獨立：

Peoples which have never had a history of their own, which from the time when they achieved the first, most elementary stage of civilization already came under foreign sway, or which were forced to attain the first stage of civilization only by means of a foreign yoke, are not viable and will never be able to achieve any kind of independence.

羅斯與土耳其在 1877 年開戰，馬克斯判斷俄羅斯可能落敗，興沖沖地宣告歐洲歷史已經來到轉捩點，因為過去俄羅斯是不可撼動的反革命堡壘，此番勢必爆發革命，相較之下，當時法國第三共和國所面對的憲政危機是小巫見大巫 (Munck, 1986: 17)。所以，不管是馬克斯的「進步／具有革命性的 vs. 反動／反革命的民族主義」、或是恩格斯借自黑格爾的「有歷史 vs. 沒有歷史的民族」，已經悄悄地調整為「被支配者 vs. 支配者的族主義」(Munck, 1986: 16, 22)。

恩格斯在 1872 年 (5/14) 針對愛爾蘭分支是否能以獨立於英國分會 (British Federal Council) 的身分加入第一國際，認為儘管愛爾蘭人講英語，因為即使經過 700 年的征服、以及壓迫，他們卻是獨特的民族；因此，只要不平等的民族支配關係存在的一天，宛如俄羅斯之於波蘭，那麼，把愛爾蘭工人納入英國分會就是一種羞辱，畢竟²² (MEI, 1972: 302-303)：

要是一個征服民族的成員要求被征服者忘記他們獨特的民族性、壓抑民族差異等等，那不是國際主義，而是要求他們臣服於枷鎖，也是試圖以國際主義的外衣合理化征服者的持續支配。這樣的作法等於鼓勵英國工人的想法，認為自己跟貴族一樣比愛爾蘭人優秀，宛

²² 原文是：

There was the fact of seven centuries of English Conquest and oppression of Ireland, and so long as that oppression existed, it was an insult to Irish working men to ask them to submit to a British Federal Council. The position of Ireland with regard to England was not that of an equal, it was that of Poland with regard to Russia.

.....
If members of a conquering nation called upon the nation they had conquered and continued to hold down to forget their specific nationality and position, to "sink 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so forth, that was not Internationalism, it was nothing else but preaching to them submission to the yoke, and attempting to justify and to perpetuate the dominion of the conqueror under the cloak of Internationalism. It was sanctioning the belief, only too common among the English working men, that they were superior beings compared to the Irish, and as much an aristocracy as the mean whites of the Slave States considered themselves to be with regard to the Negroes.

In a case like that of the Irish, true Internationalism must necessarily be based upon a distinctly national organisation; the Irish, as well as other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could enter the Association only as equals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conquering nation, and under protest against the conquest. The Irish sections, therefore, not only were justified, but even under the necessity to state in the preamble to their rules that their first and most pressing duty, as Irishmen, wa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national independence.

如美國蓄奴州的白人凡夫相信本身比黑人高尚。

諸如愛爾蘭的例子，真正的國際主義必須根據明顯不同的民族組織。愛爾蘭人跟其他被壓迫的民族一樣，可以跟征服民族一起加入第一國際，同時表達對征服的抗議。因此，愛爾蘭分會的成立不只是有正當性，甚至於有義務在其章程的前言說，身為愛爾蘭人最重要的責任是獲致自己的民族獨立。

馬克斯 (1882/2/7) 過世前寫信給考茨基 (Karl Kautsky) 說：愛爾蘭人及波蘭人在成為國際主義者之前，不僅有權利、更有義務作為民族主義者；只有在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之後，他們才能獲致最高的國際主義境界²³ (MEI, 1972: 332)。

參、馬克斯眼中被英國殖民的愛爾蘭

馬克斯對於愛爾蘭歷史的關注雖然不如恩格斯²⁴，也不像恩格斯那麼豪氣，誇誇其談「如果沒有看過愛爾蘭人就無法瞭解他們，給我二十萬愛爾蘭人，就可以推翻整個英國王室²⁵」(MEI, 1972: 33)，卻也用了不少心思去理

²³ 原文是：

I therefore hold the view that *two* nations in Europe do not only have the right but even the duty to be nationalistic before they become internationalists: the Irish and the Poles. They are most internationalists when they are genuinely nationalistic.

²⁴ 恩格斯分別在 1856、1869、以及 1870 年走訪愛爾蘭 (Murphy, 2015: 86)。他在 1869 年尾及 1870 年之間大量閱讀愛爾蘭的文獻，打算寫一本愛爾蘭史，不過，由於普法戰爭、巴黎公社、以及第一國際的內鬨，只寫了兩章就中斷，第一章〈自然條件〉比較完整、第二章〈古愛爾蘭〉並未完成，留下大綱、筆記、以及詳細的年表 (MEI, 1972: 171-269, 449, note 178)。恩格斯在 1870 年 (1/19) 寫信給馬克斯，分享他對愛爾蘭文獻的研讀，認為在對照之下，凱爾特愛爾蘭語 (Celtic-Irish) 並不是那麼難 (MEI, 1972: 286)。恩格斯在 1856 年首度前往愛爾蘭，些了一封信給馬克斯，描繪當地在 1100-1850 年之間經過英國鐵腕統治下變成廢墟；他說，英國公民的所謂自由是建立在對於殖民地的壓迫，抱怨根本看不到所謂的自治，這裡因此可以說是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連愛爾蘭人在自己的國家都覺得不自在，甚至於，愛爾蘭人的特色只有在狗身上才看得到 (MEI, 1982: 83-85)。

²⁵ 原文是：

People who have nothing to lose, two-thirds of whom are clothed in rags, genuine

解愛爾蘭的歷史發展。馬克斯（1864/10/21）在第一國際創會時的演講，兩度提到愛爾蘭。他在 1867 年（12/16）向倫敦的日耳曼工人教育協會（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講了一場〈愛爾蘭問題〉，除了簡要的演講紀錄、還留下一些基本的背景資料（MEI, 1972, 140-42, 126-39）。馬克斯在這兩份文稿，將愛爾蘭的歷史發展分為七期（MEI, 1972: 127-39）：

1. 宗教改革之前：英裔教宗亞得里安四世（Adrian IV）將愛爾蘭當作禮物送給英國，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133-89）在 1172 年征服將近三分之一的愛爾蘭，馬克斯形容英國的征服方式宛如美國對付印第安人的戰爭。此後，不僅英國貴族與愛爾蘭酋長聯姻，普通殖民者也跟愛爾蘭老百姓通婚。
2. 16-17 世紀的殖民：英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決心消滅叛服不常的愛爾蘭人、移入忠誠的英國人來填補²⁶，終究只扶植了一些英裔的地主貴族；在清剿的過程，英愛通婚的天主教後裔跟當地人並肩作戰²⁷。在詹姆士一世（James I, 1603-25）時期，新教授機客豪奪巧取政府所沒收的土地；愛爾蘭人在 1641 年趁英國內戰在全島各地發動革命，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剪除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49）後於 1649 年登陸，燒殺擄掠，將不少愛爾蘭人賣到西印度群島為奴，包含英裔愛爾蘭人。
3. 1660-92 年：斯圖爾特（Stuart）王朝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 -85）在 1660 年復辟（Restoration），開始拉攏愛爾蘭人，除了照拂天主教會的利益、還招募了一支天主教徒兵團。皈依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兄終弟及，他讓天主教自由發展、並調動天主教徒兵團到英國馳援。
4. 1692-1776 年：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50-1702）在 1690

proletarians and sansculottes and, moreover, Irishmen, wild, headstrong, fanatical Gaels. One who has never seen Irishmen cannot know them. Give me two hundred thousand Irishmen and I will overthrow the entire British monarchy.

²⁶ 仕紳、以及生意人只要臣服，就可以獲得大片土地（MEI, 1972: 140）。

²⁷ 這些英國人是在宗教革命（Reformation）之前就前來愛爾蘭，他們被愛爾蘭妻子轉變為愛爾蘭人（Irishmen）（MEI, 1972: 140）。

年登陸愛爾蘭，擊敗在光榮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被黜的詹姆斯二世、及他的愛爾蘭盟軍。英愛議會為虎作倀²⁸，在 1698 年立法打擊愛爾蘭的製造業；百姓反對那些住在倫敦的地主，議會開始有獨立的呼聲²⁹。在安妮女王 (Queen Anne, 1665-1714) 時期，英愛議會通過一系列惡名昭彰的『懲戒法』(Penal Code) 來打壓天主教徒、扶植新貴³⁰，也讓愛爾蘭人更加倚賴教會、窮人變得懶散。

5. 1776-1801 年：新來的英國人被愛爾蘭人吸納、並皈依為天主教徒，也就是英裔愛爾蘭人 (English Irish)。這時候，除了北愛爾蘭 (Ulster) 外，其他地方的土地雖然屬於英國地主，沒有新的墾殖地出現。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後，英國的高壓統治逐漸放鬆，與英國的自由貿易也在 1779 年開放，愛爾蘭快速發展、甚至於超越英國。

6. 1801-46 年：英國國會、及英愛議會在 1800 年同步通過『統一法案』(Act of Union)³¹，英裔愛人接受收買³²、不再對抗英國，不過，殖民地依然視合併為非法之舉。此後，愛爾蘭的製造業因為政治結合而逐漸萎縮³³，土地紛紛被迫轉為農地，老百姓若非不計代價 (地租) 變成佃農、就是活活餓死。大地主把土地租給投機客，經過四、五

²⁸ 由新教徒所支配，聽命於英國行事。

²⁹ 馬克斯認為這是英國在愛爾蘭這塊殖民地與英國民族 (English Nation) 的鬥爭，同時也是英愛殖民地 (Anglo-Irish Colony) 與愛爾蘭民族 (Irish Nation) 的鬥爭 (MEI, 1972: 129)。

³⁰ 主要是透過教育、財產、宗教、以及兵役措施，鼓勵天主教徒改信新教，譬如將天主教徒的財產轉移給新教徒 (天主教徒不准立遺囑、不准繼承財產)，天主教徒不可以當地主、服公職、或是當兵，傳播天主教士重罪、幫新教徒洗禮為天主教徒是叛國、以及驅逐主教 (如果遁回將以高度叛國判以絞刑、剖腹、及分屍) (MEI, 1972: 129-30, 140-41；參考 Macdonald, 1985: 8; Joyce, 1909)。

³¹ 英國的法案簡稱 *Union with Ireland Act 1800*，愛爾蘭的簡稱是 *Act of Union (Ireland) 1800*。在 1801 年，彼此結合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³² 根據這個法案，愛爾蘭議會被解散，交換的條件是在英國下議院 650 席當中，愛爾蘭人可以獲得 100 席 (Anderson, 2010: 116)。

³³ 後來移民美國參加南北戰爭、升到將軍的 Thomas Francis Meagher 曾經說：愛爾蘭的工業完全被摧毀，只剩下棺材的製造 (MEI, 1972: 141)。

次層層轉租，地租高得嚇人（MEI, 1972: 141）。

7. 1846-67 年：愛爾蘭因為馬鈴薯枯萎病而造成大饑荒³⁴（Great Famine, 1845-47），超過百萬人死亡。之後，英國廢除『穀物法』（*Corn Law, 1815*），愛爾蘭的穀物在英國不敵競爭而價格大跌，農民繳不出租金，只好外移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罕、或格拉斯哥³⁵。政府接著祭出『土地抵押法』（*Encumbered Estates Act, 1848*），先讓捐客趕走本土地主、再軟硬兼施驅離佃農³⁶。

馬克斯認為，「愛爾蘭青年」（Young Irelander）於 1848 年起義失敗，民族自信淪喪（MEI, 1982: 76）。他在 1855 年（3/16, 8/8）於《新奧得報》（*Neue Oder-Zeitung*）揭露愛爾蘭領袖 Daniel O'Connell 等人如何利用「愛爾蘭兵團」（Irish Brigade）在英國國會周旋於保守黨（Tories）、及輝格黨（Whigs）間，換取人事的酬庸：英國人的基本作法是軟硬兼施，一面施小惠進行收買³⁷、一面以『約制法』綏靖，而這些唯利是圖的愛爾蘭政客只要教會的權力能獲得保障，當然就不會認真地去探討愛爾蘭的真正病灶，因此，不管是早先推動廢除愛爾蘭與英國的結合、還是保障佃戶的權利³⁸，都只是用來討價還價的工具（MEI, 1982: 74-76, 79-82）。

肆、馬克斯對愛爾蘭問題的病理分析

馬克斯在 1853 年（2/9）寫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章，指控英國首相

³⁴ 馬克斯認為馬鈴薯感染枯萎病是因為土地過度使用，這是英國統治所造成的；隨著土地的耗盡，人口也跟著衰竭，愛爾蘭的身心障礙人數增加（MEI, 1972: 141）。

³⁵ 馬克斯（1852/10/15）甚至於將英國政府以大飢荒來處理愛爾蘭的貧窮的方式，也就是以廢除『穀物法』著手所謂自由貿易，比喻為用砒來徹底消滅老鼠。

³⁶ 參考 Fox（1974: 9）、以及 Black（1960）。

³⁷ 譬如在 1829 年立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進一步著手所謂的「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

³⁸ 在鴨巴甸伯爵（Earl of Aberdeen, 1852-55）擔任首相時，聯合政府有立法保障佃權之議，算是亡羊補牢粗暴的『土地抵押法』（1848），也就是當地主打算終止租約之際，應該補償佃戶的貢獻，包括灌溉、排水、肥料、或是農舍（MEI, 1982: 58, 67-69, 77-78）。

巴麥尊子爵 (Viscount Palmerston, 1855-58, 1859-65) 在愛爾蘭所進行的「財產清理」(clearing estates) 形同掠奪，不僅過程弊端重重，還暴力相向，教會及老百姓都遭殃 (MEI, 1972: 53)。馬克斯認為，相較於克倫威爾野蠻地仿效羅馬人移入殖民者來排擠愛爾蘭人、或俄羅斯人取代被趕走的波蘭人，當下的英國政府則是愚蠢地東施效顰，使用綿羊 (9,600,000 隻³⁹)、及豬牛來取代百萬當地人，把農地變成牧地，歷史上恐怕只有統治中國的蒙古人有過這樣的奇想 (MEI, 1972: 147-48, 142)。就這樣，愛爾蘭變成英國的一個農業地區 (MEI, 1972: 105, 123)、淪為英國經濟的附屬品 (Cummins, 1980: 106)。

馬克斯在 1853 年 (3/22) 的文章〈強迫遷徙〉(Forced Emigration) 細部分析到，在 1847-52 年之間，英國遷徙的人口總共有 1,618,376 人，其中愛爾蘭人就佔了 1,200,435 人⁴⁰ (74%)；以利物浦為例，高達 90% 的外來人口來自愛爾蘭 (MEI, 1972: 54-55)。他回顧人類的歷史，除非透過奴隸制度來維持生產力，文明人只好著手強制遷徙，譬如希臘、以及羅馬必須周期性地尋覓新的殖民地；同樣地，亞洲高原的野蠻人必須不斷進行侵略來遷徙過剩的人口，以維持生產力與人口之間的平衡。然而，現代的強制遷徙不像過去是人口製造生產壓力，而是肇因生產力給人口帶來壓力，以致於農村的人口不見了、通通湧向都市的製造業中心 (MEI, 1972: 57-58)。

馬克斯 (1853/6/28) 剖析在外地主如何不斷提高租金，壓榨愛爾蘭佃戶所投入的勞力、以及資本：要是佃農同意付較高的租金，不啻付利息給地主、感謝自己在土地上所投入的心血，豈有此理；然而，他要是拒絕，就會被無情撤租，隨時有人願意取代。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下，即使佃農勤勞、又懂一點生財之道，努力的成果免不了會被抽走，生活情況一代不如一代；相對地，要是佃農漫不經心，又會被歸咎是「原住凱爾特種族的錯」(aboriginal faults of the Celt race)。因此，愛爾蘭佃農註定只有當窮光

³⁹ 這個數字或許有誤 (多一個位數)，因為根據在 1867 年 (11/26) 的一份演講草稿，在 1855-66 的十年，家畜總共增加約百萬 (MEI, 1972: 121)。

⁴⁰ 在 1851-66 年之間，愛爾蘭人口減少了 1,730,189 人 (MEI, 1972: 121)；另一個數字是在 1845-66 年之間，愛爾蘭移出人數有 1,990,244 人 (MEI, 1972: 136)。

蛋一途，不是冒著辛勤及投資的利潤被搜刮的風險、再不然就是心不在焉而困窮，對於這些「任人宰割的佃農」(tenants-at-will)而言，橫豎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MEI, 1972: 59-61, 77)。

馬克斯 (1853/7/11) 發現，英國地主每次只要傷害一名愛爾蘭佃農，他們壓迫的伎倆就會熟能生巧；事實上，後來的佃農本身只不過是用來傷害前一位佃農的工具，而被逼走的舊佃戶則是向新佃戶提高租金的手段，不斷循環炮製；他認為，儘管貧窮的愛爾蘭佃農屬於這塊土地，土地的所有權卻屬於不在地的英國業主，這種關係宛如搶匪把手槍指著過客的錢包，愛爾蘭人一旦被土地抵押法委員會 (Encumbered Estates Commission) 的判決木槌擊倒，就只好摸著鼻子認命地接受被強制遷徙的命運 (MEI, 1992: 62)。

馬克斯認為在正常的情況下，政府並不應該介入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然而，英國卻不時顛覆愛爾蘭的社會條件，先是沒收土地、接著透過立法來打壓工業、再使用武力加以禁錮，扶植了一個貪婪的世襲地主階級，聽任這群人決定愛爾蘭人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過活；愛爾蘭人如果尋求改革，卻又勢必面對血腥的刺刀相向，束手無策，終究難逃自己先天有缺陷的訕笑 (MEI, 1972: 61)。總而言之，英國對改變愛爾蘭社會的三部曲如下：先是聽任大飢荒餓死百萬愛爾蘭人，接著移民又走了百萬小佃農人到美國及澳洲，最後一招是透過國會立法，讓拍賣官、或是法警趕走殘餘的本土地主 (MEI, 1982: 76)。

馬克斯在 1868 年 (4/16) 寫信 Ludwig Kugelmann 指出，愛爾蘭的社會革命必須嚴肅地從根本開始，也就是土地所有權。其實，他先前在 1867 年 (11/2)，目睹英國強制驅離愛爾蘭佃農、硬生生剝奪其改善土地所做的投資，怒氣沖沖地寫信告訴恩格斯：他過去以為愛爾蘭要跟英國分手是不可能的，現在則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其他歐洲國家的外來統治者如此粗暴過，畢竟，俄羅斯人採取政治解決、而普魯士人則進行購買 (MEI, 1972: 143-44)。

伍、馬克斯對愛爾蘭的戰術考量

原本，馬克斯與恩格斯認為愛爾蘭的解放必須仰賴英國的政治改革運動，因此，兩人在 1840-50 年代建議愛爾蘭革命運動者應該把重心放在內部的階級衝突，提醒他們一些地主是愛爾蘭人而非英國人，並鼓勵他們仿效英國工人、積極參與憲章運動⁴¹(Chartism, 1838-48)。恩格斯在 1949 年(1/9)興致勃勃地鼓勵愛爾蘭人與英國工人並肩作戰 (MEI, 1972: 48-50)，這也就是 Cummins (1980: 108) 所謂解放愛爾蘭的「以英國為中心」(Anglocentric) 途徑。

在 1867 年 (9/13-23)，馬克斯與未來的女婿 Paul Lafargue 到曼徹斯特與恩格斯討論《資本論》出版事宜，碰上兩名愛爾蘭共和國兄弟會 (Fenians、或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領導者 (Thomas Kelly、以及 Timothy Deasy) 早先被捕 (9/11)，同志劫囚殺死一名戒護的英警，三名被捕的成員 (William Allen、Michael Larkin、及 Michael O'Brien) 在 11/23 被吊死 (Anderson, 2010: 126; Henderson, 1989)，史稱「曼徹斯特烈士」(Manchester Martyrs)。恩格斯 (11/24) 寫了一封信給馬克斯⁴²，認為英國的作法有如禽獸，預言愛爾蘭分手的時機已經成熟：此後，愛爾蘭母親唱歌給搖籃中的嬰兒，這些英雄將成為原本欠缺的烈士，畢竟，文明的國家很少會把造反者的政治行為當作普通犯來處理 (MEI, 1972: 145)。

馬克斯在 1869 年 (11/29) 寫給 Ludwig Kugelmann 的信指出，一定要跟英國勞動階級曉以大義：支持愛爾蘭獨立並非因為同情愛爾蘭人、而是關心自己的利益，因為只要那些英國土地貴族在愛爾蘭保有牢固的前哨，英國勞動階級就無法加以推翻，也就不可能出現解放的條件；相對地，如果能讓愛爾蘭人獲得自主、有自己的議會，要推翻當地的英國土地貴族就易如反掌，因為這些外來的地主並非本土的傳統仕紳、或民族代表，而是

⁴¹ 也就是要求 21 歲普選、秘密投票、廢除國會議員參選的財產資格、國會議原有給職、各選區選民人數相等、以及每年改選 (Wikipedia, 2018: Chartism)。

⁴² 第一國際在行刑前動員兩萬工人在倫敦要求免死，而馬克斯則是陳情書的主筆者 (Anderson, 2010: 126)。

不知死活、被痛恨的壓迫者 (mortally hated oppressors)；因此，英國工人階級的愛爾蘭政策必須與統治階層切割、支持廢除愛爾蘭與英國的結合，否則將一事無成，所以，爲了自己的解放，就應該把槓桿放在愛爾蘭 (the lever has to be applied here) (MEI, 1972: 281) (附錄 1)。

同樣地，馬克斯在 1870 年 (3/5) 寫給二女蘿拉夫婦 (Laura & Paul Lafargue) 的一封信說明，他支持愛爾蘭獨立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有其他的盤算：英國是地主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心，爲了加速歐洲的社會發展，必須想辦法給英國官方製造麻煩；由於愛爾蘭是英國的弱點，因此，英國只要失去愛爾蘭、整個帝國就會頓時化爲烏有，那時候，原本沈睡的階級戰爭就會刻不容緩⁴³ (MEI, 1972: 290)。換句話說，他關心的不只是愛爾蘭的獨立，還關切英國、及歐陸的社會革命，所以，那是面對新情勢所做的權宜性調整，希冀民族運動與工人運動做策略性的結盟 (Munck, 1986: 18)。

馬克斯進一步在 1870 年分別寫信給知己 Ludwig Kugelmann (3/28)⁴⁴、以及人在美國的 Sigfrid Meyer 與 August Vogt (4/9)，分享他對於英國在愛爾蘭殖民統治的看法 (MEI, 1972: 160-61, 292-94) (附錄 2)：儘管革命的倡議或許來自法國，英國才是真正能發動經濟革命的槓桿，其他國家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畢竟她是地主、以及世界資本之都；至於愛爾蘭則是英國貴族地主 (landed aristocracy)、及資本主義的堡壘 (bulwark)，這些人唯有透過在愛爾蘭的剝削，才能維持自己在英國的支配；要是英國召回駐紮在愛爾蘭的軍隊、以及警察，立即就要面對當地農民的叛亂，因此，如果能

⁴³ 原文是：

You understand at once that I am not only acted upon by feelings of humanity. There is something besides. To accelerat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you must push on the catastrophe of official England. To do so, you must attack her in Ireland. That's her weakest point. Ireland lost, the British "Empire" is gone, and the class war in England, till now somnolent and chronic, will assume acute forms. But England is the metropolis of landlordism and capitalism all over the world.

⁴⁴ 這封密函是馬克斯針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 (Mikhail Bakunin) 的一些指控，透過 Ludwig Kugelmann，給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 (Germ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的領導者傳閱 (MEI, 1972: 446, note 163；參閱網路版的說明)。

推翻宰制愛爾蘭的這些貴族，就可以促成英國的勞動階級革命；要是愛爾蘭的地主階層崩盤了，英國的地主階層也就會隨著垮台。

問題是，儘管英國具備社會革命所需要的物質要件、及道德力量，他們的勞動階層卻缺乏實踐的革命熱情。馬克斯接著判斷，要推翻英國在愛爾蘭的貴族，相較之下比在本土簡單百倍以上，因為土地自來是愛爾蘭自的社會問題，對於絕大多數的愛爾蘭人來說，土地不僅攸關生死存亡、也是民族課題，因此比英國更具革命性、更容易撩撥；相對地，英國的資產階級跟貴族在愛爾蘭有共同的利益，他們透過強制驅離、及強迫移民，將當地的人口降到最低，把農地變成生產廉價的肉品、及羊毛的牧地（MEI, 1972: 161-62, 293）。

只不過，馬克斯發現最糟糕的是，由於愛爾蘭不斷供給過剩的勞工到英國，讓英國勞動階級的工資、以及生活條件一再下降，以至於在英國的勞動階級分裂為你死我活的兩個陣營，特別是英國勞工痛恨愛爾蘭勞工的競爭；英國勞工的本性踏實卻溫吞，他們自認為屬於統治的民族（*ruling nation*），高高在上，對於愛爾蘭工人充滿偏見，宛如美國南部貧窮的白人對於「黑鬼」的鄙夷，無形中把自己矮化為貴族、及資本家用來對付愛爾蘭的工具。相對地，已經充滿革命怒火的愛爾蘭工人則嗤之以鼻，認為這些人只不過是英國統治愛爾蘭的共犯、愚蠢的打手，你來我往、互不相讓⁴⁵（MEI, 1972: 162, 293-94）。

馬克斯寫信給 Sigfrid Meyer 與 August Vogt（1870/4/9）分析道，英國是宰制世界市場的強權、也是最重要的工人革命國家、更是唯一革命物質條件已經發展成熟的地方，而第一國際的要務是加緊英國的社會革命，唯一的途徑就是讓愛爾蘭獨立、凸顯英國與愛爾蘭的衝突、讓大家願意公開支持愛爾蘭的獨立；為了達成這個崇高的目標，就必須先喚醒英國工人的意識，讓他們能夠充分理解到，對於愛爾蘭民族的解放的關心絕對不是出

⁴⁵ 馬克斯指出，資產階級維持統治的秘方是透過媒體、講壇、或是漫畫，無所不用其極地刻意強化雙方的人為敵視，也因此，儘管英國勞動階級相當有組織，卻渾然不知本身被操縱（MEI, 1972: 294）。

於抽象的正義、或人道的情操，而是解放自己的首要條件（MEI, 1972: 294）。換句話說，必須說服他們說，兩者的命運緊密地連結在一起（Cummins, 1980: 109）。馬克斯預言，一旦兩個國家的強制結合結束，社會革命立即會在愛爾蘭出現——儘管是以過時的[民族主義]方式——然後，英國再也沒有藉口在愛爾蘭駐紮一支龐大的軍隊，或許可以透過平等而自由的邦聯，最後達成完全獨立（MEI, 1972: 162-63）。

陸、後來愛爾蘭的實際發展

馬克斯與恩格斯最早並不支持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後來相信愛爾蘭的獨立可以削弱英國的殖民主義、進而帶動歐陸的社會革命，因此支持他們的民族自決、及民族解放，同時希望愛爾蘭的勞動階級與英國勞動階級攜手合作，共同推翻英國的帝國。終究，馬克斯對於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感到失望，加上巴黎公社失敗（1871）、以及第一國際解體（1876），他在1870年代將焦點放在東方的俄羅斯，當然，革命的論述又必須隨著時勢變動作調整（Munck, 1986: 19-22）。所以，即使馬克斯可以支持愛爾蘭的民族自決，出發點是工具性的。

在「曼徹斯特烈士」就義後（1867），保守黨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68, 1874-80）、以及自由黨的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68-74, 1880-85, 1886, 1886-94）輪流出任英國首相，兩人扮演黑白雙簧，尤其是後者採取軟鞭牽豬的策略，愛爾蘭政治人物對於社會革命意興闌珊。

恩格斯在1882年（6/26）寫信給Eduard Bernstein（MEI, 1972: 334-35；參考Fox, 1974, pp. 14-15），注意到除了傳統的農民抗爭、以及由都會資產階級所發動的自由派民族運動，在美國南北戰爭後，愛爾蘭共和國兄弟會寄望美國伸出援手，要不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或者在美國的保護下建立共和國；他認為除非美國、或是法國對英國發動戰爭，愛爾蘭的起義絕對不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他判斷法國不可能動干戈，而儘管美國政客為了討好愛爾蘭裔選民花言巧語，也不可能會為了愛爾蘭出兵。話又回來，恩格斯判斷，果真英國面對美國出手干預的威脅，除了獨立，應該會接受愛爾

蘭人所開出來的任何條件 (p. 336)。

馬克斯在 1883 年 3 月 14 日過世，恩格斯在半年後 (9/20) 接受《紐約人民報》(*New Yorker Volkszeitung*) 訪問時表示，短期內，愛爾蘭不可能出現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那裡的百姓渴望變成擁有土地的農民，抵押的情況接著就會出現，然後摧毀一切的努力；然而，他並沒有悲觀地放棄愛爾蘭的農民，還是堅持必須協助他們擺脫地主，如此，才有可能由半封建的情況進入資本主義的條件 (MEI, 1972: 342)。終究，馬克斯、以及恩格斯無緣親睹愛爾蘭後續發展⁴⁶，畢竟，愛爾蘭的獨立並非決定於英國資本主義的崩盤，另外，他們也忽略北愛爾蘭的工業發展 (Cummins, 1980: 116)。Rodden (2009: 253) 認為，馬克斯、以及恩格除了低估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以及天主教信仰在背後所提供的力量，才會要愛爾蘭人削足適履。

Szporkluk (1988: 192) 歸納得好：一開頭，馬克斯與恩格斯對於民族、以及民族主義現象的態度是負面的；然而在實務上，他們發現無法單單以階級的概念來加以打發、解碼、或是涵蓋，只好一再對理論稍做修正；終究，兩人並未重新檢視自己的理論基礎、也未能提出通盤的理論。因此，從德國、愛爾蘭、到俄羅斯，他們必須不斷地調整以包容民族主義，從正面來看是務實的工具性考量，從負面來看，卻是左支右絀、節節敗退。Zwick (1983: 35) 說，馬克斯主義者即使支持民族運動，並不用因此變成民族主義者，聽不出來究竟是誇耀、調侃、還是犬儒。

進入二十一世紀，Zwick (1983: 36-41) 把馬克斯及恩格斯的門徒，依照光譜分為左、中、右三條路線⁴⁷：(一) 左派的蒲魯東主義 (Proudhonist) 採取世界主義的反民族主義立場，譬如猶太裔的波蘭人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她堅持古典的馬克斯主義，也就是勞動階級運動必須完全仰賴自己的團結、及階級意識的發展；(二) 右派的奧地利馬克斯

⁴⁶ 由十九世紀末到一次大戰前後的發展，見 Boyce (1988)、Curtis (1963)、McCaffrey (1968)、Macdonald (1985)、Mansergh (1975)、Morton (1980)、Smith (1999)、以及 Walsh (2002)；有關於北愛爾蘭的和平見施正鋒 (2008)，當代的愛爾蘭民主政治見施正鋒、謝若蘭 (2009)。

⁴⁷ 見 Luxemburg (1976)、Bauer (2000)、Lenin (1939)、以及 Löwy (1976)。

主義 (Austro-Marxism) 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奧托·鮑爾 (Otto Bauer, 1881-1938)，以奧匈帝國多民族的經驗，主張必須正視民族主義，特別是採取文化自治，因而往往被控偏離馬克斯主義；以及 (三) 中間派的想法來自列寧 (Vladimir Lenin, 1870-1924)，他目睹少數民族被帝俄肆虐，認為必須處理民族問題、甚至於主張民族運動有利用的價值。這是另一個課題了。

附錄 1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⁴⁸

You will probably have seen in the *Volksstaat* the resolutions against Gladstone proposed by m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rish amnesty. I have now attacked Gladstone — and i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here — just as I had formerly attacked Palmerston. The demagogic refugees here love to fall upon the Continental despots from a safe distance. That sort of thing attracts me only when it is done *vultu instantis tyranni*.

Nevertheless, both my utterance on this Irish amnesty question and my further proposal in the General Council to discuss the attitude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o Ireland and to pass resolutions on it have of course other objects besides that of speaking out loudly and decidedly for the oppressed Irish against their oppressors.

I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vinced—and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driving this conviction home to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that it can never do anything decisive here in England until it separates its policy with regard to Ireland most definitely from the policy of the ruling classes, until it not only makes common cause with the Irish but even takes the initiative in dissolving the Union established in 1801 and replacing it by a free federal relationship. And this must be done, not as a matter of sympathy with Ireland but as a demand mad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English proletariat. If not, the English people will remain tied to the leading-strings of the ruling classes, because it will have to join with them in a common front against Ireland. Every one of its movements in England itself is crippled by the strife with the Irish, who form a very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he primary condition* of emancipation here—the overthrow of the English landed oligarchy—remains impossible because its position here cannot be stormed so long as it maintains its strongly entrenched outposts in Ireland. But, once affair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Irish people itself, once it is made its own legislator and ruler, once it becomes autonomous, the abolition there of the landed aristocracy (to a large extent the *same persons* as the English landlords) will be infinitely easier than here, because in Ireland it is not merely a simple economic ques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a *national* question, for the landlords there are not, like those in England, the traditional dignitarie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 but its mortally hated oppressors. And not only does England's internal social development remain crippled by her present relations with Ireland; but also her

⁴⁸ 1869/11/29 (MEI, 1972: 280-81).

foreign policy, and in particular her policy with regard to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since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undoubtedly throws the decisive weight into the scale of social emancipation generally, the lever has to be applied 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nglish republic under Cromwell met shipwreck in Ireland. *Non bis in idem!* The Irish have played a capital joke o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by electing the “convict felon” O’Donovan Rossa to Parliament. The government papers are already threatening a renewed suspension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a renewed system of terror. In fact England never has and never *can*—so long as the present relations last—rule Ireland otherwise than by the most abominable reign of terror and the most reprehensible corruption.

附錄 2

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 on Bakunin⁴⁹

Although revolutionary *initiative* will probably come from France, England alone can serve as the lever for a serious economic revolution. It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no longer any peasants and where landed property is concentrated in a few hands. It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 capitalist form – that is, labor combined on a large scale under capitalist entrepreneurs – has taken over practically the whole of production. It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consists of wage labourers*. It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 class struggl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by the trade unions have att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maturity and universality. It i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anks to it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ever revolution i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must directly affect the whole world. While on the one hand landlordism and capitalism have their classic seat in this countr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ir destruction 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mature here. The General Council is now in the *happy position of having its hand directly on this great lever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hat folly, we might almost say even what a crime, to let this lever fall into purely English hands!

The English have at their disposal all necessary *material* prerequisites for a social revolution. What they lack is the *spirit of genera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feveour*. Only the General Council can provide them with this, and thus accelerate a tru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ere and, in consequence, *everywhere*. The great effect we have already had is attested by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newspapers of the ruling classes, as, e.g., *Pall Mall Gazette*, *Saturday Review*, and *Fortnightly Review*, not to speak of the so-called radicals in the *Commons* and the *Lords* who a little while ago still exerted a big influence on the leaders of the English workers. They accuse us publicly of having poisoned and practically stifled the *English spirit*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of having pushed it to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

If England is the bulwark of landlordism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the only point where one can hit official England really hard is *Ireland*.

In the first place, Ireland is the *bulwark* of English landlordism. If it fell in Ireland, it would also fall in England. In Ireland this is a hundred times easier since *the economic*

⁴⁹ 1870/3/28 (MEI, 1972: 160-63).

struggle there is concentrated exclusively on landed property, since the struggle is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and since the people there are more revolutionary and exasperated than in England. Landlordism in Ireland is maintained solely by the *English army*. The moment the *forced un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nds, a social revolution will immediately break out in Ireland, though in outmoded forms. English landlordism would not only lose a great source of wealth, but also its *greatest moral force*, i.e., that of *representing the domination of England over Irel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maintaining the power of their landlords in Ireland, the English proletariat makes them invulnerable in England itself.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English bourgeoisie has not only exploited the Irish misery to keep down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by *forced immigration* of poor Irishmen, but it has also divided the proletariat into two hostile camps. The revolutionary fire of the Celtic worker does not go well with the nature of the Anglo-Saxon worker, solid but slow. On the contrary, in all *the big industrial centres in England* there is a profound antagonism between the Irish and English proletarians. The average English worker hates the Irish worker as a competitor who lowers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fe*. He feels national and religious antipathies for him. He regards him practically in the same way the the poor white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regard the black slaves. This antagonism between the proletarians in England is artificially nourished and kept alive by the bourgeoisie. It knows that this split is the true secret of maintaining its power.

This antagonism is reproduced also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The Irish, driven from their native soil by the *bulls* and the sheep, reassemble in North America, where they constitute a conspicuous and ever-growing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ir only thought, their only passion, is hatred for England.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or the classes they represent) play on these passions in order to perpetuate the covert strugg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They thereby prevent a sincere and serious alliance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nd, consequently, their emancipation.

Furthermore, Ireland is the only pre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has for maintaining a big standing army, which in case of necessity, as has happened before, can be loosed against the English workers after getting its military training in Ireland.

Lastly, England today is seeing a repetition of what happened on a gigantic scale in Ancient Rome. A nation that oppresses another forges its own chains.

Thus, the attitud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Irish Question is very clear. Its first need is to encourage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o this end, a

great blow must be struck in Ireland.

The General Council's resolution on the Irish amnesty serves only as an introduction to other resolutions which will affirm that, quite apart from international justice, it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o transform the present *forced union* (i.e., the enslavement of Ireland) into an *equal and free confederation*, if possible, into complete separation, if need be.

參考文獻

- 馬克斯、恩格斯，1848。《共產黨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018/3/11)。
- 施正鋒。2008。〈北愛爾蘭的和平〉《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卷4期，頁117-43。
- 施正鋒，2015。〈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卷3期，頁1-37。
- 施正鋒，2017。〈原住民族的自決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11卷4期，頁1-32。
- 施正鋒、謝若蘭（編），2009。《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Anderson, Kevin B. 2010.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uer, Otto. 2000.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ttps://libcom.org/files/Otto%20Bauer%20-%20The%20Question%20of%20Nationalities%20and%20Social%20Democracy.pdf>) (2018/3/22)
- Black, R. D. Collison. 1960.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Irish Question, 1818-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yce, D. G. 1968. *The Irish Question and British Politics 1868-1986*. Basingstoke: Macmillan Education.
- Burke, Edmund. 1813.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Vol. 5. New York: Eastburn, Kirk, & Co.
- Connolly, James. 2013 (1910). *Labour in Irish History*. Dublin: Brocaire Book.
- Connor, Walker.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mmins, Ian. 1980. *Marx, Engels and National Moveme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urtis, L. P., Jr. 1963. *Coercion and Conciliation in Ireland 1880-1892: A Study in Conservative Union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gels, Frederick. 1845.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condition-working-class-england.pdf>) (2018/3/12)
- Engels, Frederick. 1849/1/8. "The Magyar Struggl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https://www.marxistsfr.org/archive/marx/works/1849/01/13.htm>) (2018/3/12)

- Engels, Frederick. 1849/2/14. "Democratic Pan-Slavism."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http://marxists.anu.edu.au/archive/marx/works/1849/02/15.htm>) (2018/3/12)
- Engels, Frederick. 1858/10/7. "Engels to Marx in London." (https://marxists.catbull.com/archive/marx/works/1858/letters/58_10_07.htm) (2018/3/12)
- Fox, Ralph. 1974 (1932).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Irish Revolution*. Cork: Cork Workers Club (London: Modern Books) (<http://michaelharrison.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12/Marx-Engels-and-Lenin-on-the-Irish-Revolution-Ralph-Fox-Cork-Workers-Club-1974.pdf>) (2018/3/22)
- Hegel, Friedrich. 1894. *Philosophy of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ttps://ia802303.us.archive.org/33/items/philosophymind00hegeuoft/philosophymind00hegeuoft_bw.pdf) (2018/3/15)
- Henderson, W. O. 1989.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er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Frank Cass.
- Joyce, P. W. 1909. "The Penal Code," *A Concise History of Ireland* (<http://www.libraryireland.com/JoyceHistory/Penal.php>) (2018/3/10).
- Lenin, V. I. 1939. *Teachings of Karl Marx*. Calcutta: Burmon Publishing House (<https://ia801601.us.archive.org/0/items/in.ernet.dli.2015.52173/2015.52173.Teachings-Of-Karl-Marx.pdf>) (2018/3/21)
- Löwy, Michael. 1976. "Marxist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Left Review*, March-April, pp. 81-100.
- Luxemburg, Rosa. 1976.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cCaffrey, Lawrence J. 1968. *The Irish Question, 1800-1922*.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Macdonald, Hamish. 1985. *The Irish Ques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nsergh, Nicholas. 1975. *The Irish Question 1840-1921*,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ark, Karl. 1844/8/7. "Critical Notes on the Article: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Vorwärts*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08/07.htm>) (2018/3/15)
- Mark, Karl. 1852/10/15. "Pauperism and Free Trade: 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http://marxengels.public-archive.net/en/ME0693en.html>) (2018/3/11)
- Mark, Karl. 1859/1/6. "From The Question of the Ionian Islands." *New-York Daily Tribun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01/06.htm>) (2018/3/11)

- Marx, Karl. 1864/10/21.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4/10/27.htm>) (2018/3/11)
- Marx, Karl. 1867/1/22. "Poland's European Mission."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01/22a.htm>) (2018/3/12)
- Marx, Karl. 1871/5. "The Paris Commune."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1/civil-war-france/ch05.htm>) (2018/3/11)
- Marx, Karl. 1875/4.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Marx_Critique_of_the_Gotha_Programme.pdf) (2018/3/14)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Manifesto.pdf>) (2018/3/7)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2.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ed. by R. Dix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subject/ireland/index.htm>) (2018/3/10)
- Morton, Grefell. 1980. *Home Rule and the Irish Question*. Harlow: Longman.
- Munck, Ronald. 1986.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 Murphy, Lily. 2015. "Engels Visits Ireland." *Irish Marxist Review*, Vol. 4, No. 13, pp. 86-88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173-685-1-PB%20(1).pdf) (2018/3/21).
- Petrus, Joseph A. 1971.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3, No. 3, pp. 797-824.
- Poulantzas, Nicos. 2000 (1980).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Rodden, John. 2008. "'The Lever Must Be Applied in Ireland': Marx, Engels, and the Irish Questio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70, No. 4, pp. 609-40.
- Rodden, John. 2009. "Neither Popes Nor Potatoes: The Irish Question and the Marxist Answer." *Midwest Quarterly*, Vol. 50, No. 3, pp. 232-54.
- Ruairc, Liam. 2004.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Irish Question." *The Blanket*, August-September (<http://indiamond6.ulib.iupui.edu:81/marxenglenlor921g.html>) (2018/3/22)
- Senior, Nassau William. 1884. "Ireland." *Edinburgh Review*, Vol. 79, pp. 98-138.
- Smith, Jeremy. 1999.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Home Rule to Independence*. Harlow: Longman.

Szporluk, Roman. 1988.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sh, Oonagh. 2002. *Ireland's Independence, 1880-1923*. London: Routledge.

Wikipedia. 2018. "Chart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tism>) (2018/3/15)

Zwick, Peter. 1983. *National Commun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Karl Marx and Ireland*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hall endeavor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ries: First of all, what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or those between class and nation/ethnic group? Further, how had Karl Marx understood British colonialism in Ireland? In other words, how had he diagnosed Ireland's fate and what had he prescribed for the Irish? Finally, we shall look into how Marx's disciples had treated nationalism. In conclusions, we shall compare the later development in Ireland with what Marx had predicted.

Keywords: Marx, Ireland nationalism, socialism

*發表於台灣歐盟研究協會主辦「馬克斯兩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18/5/5。